

瞿秋白〈多餘的話〉的 政治文化史

• 胡明輝

摘要：瞿秋白〈多餘的話〉從1937年在《逸經》上出現到1967年至1968年初作為《討瞿戰報》的主要攻擊對象，在這橫跨三十年的歷史中，經歷了極端刻意的政治使用與曲解。〈多餘的話〉這個文本所經歷的政治文化解讀，在二十世紀的當代中國政治文化史中，具有獨特的位置與意義。本文將〈多餘的話〉的解讀分成四個階段，進行具體分析。第一階段（1937-1950）：在一個極為可疑的狀況下出版，國民黨將其當做反共宣傳，共產黨將其當做敵人的捏造。第二階段（1950-1964）：妾身未明，相關人物大多避而不談。第三階段（1964-1967）：慢慢成為歷史陰謀論的影射懷疑對象，作為「偽裝叛徒」的證據。第四階段（1967-1968）：《討瞿戰報》出版，被當做瞿秋白叛黨的鐵證，與〈李秀成自述〉一同被當做叛徒的告白，並開始被廣泛閱讀。

關鍵詞：瞿秋白 〈多餘的話〉 《討瞿戰報》 戚本禹 歷史陰謀論

在中國革命的最初階段，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中有一位面色蒼白的肺病患者，名叫瞿秋白。革命的歲月裏，他曾以超過一百個假名來隱藏自己的身份。隨着國民黨對共產黨發起血腥的「清黨」運動，瞿在1927年8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上擔綱中共總書記^①。1927至1928年間，他躍至其事業巔峰，在1928年7月於莫斯科合併召開的中共六大和共產國際六大中，更成為中共實際上的領導人之一。此後，他繼續作為斯大林的共產國際與中共領導層之間的中介人，並成為最具影響力的理論家之一^②。

除了作為一位職業革命家，瞿秋白也是一個具煽動性的作家。一如他那個時代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瞿也曾廣涉經籍、古文。在1931至1934年被逐

* 感謝我的博士生陳文寧的熱心協助，也感謝華東師範大學樊建政老師以及三位匿名評審人的意見。

出上海的中共中央委員會期間，瞿致力於揭露和攻擊中國的精英傳統文化。他將盛清時期(1683-1839)的士紳—商人階層定義為中國精英文化的主要社會代表，並對這一時期的藝術形式、文化遺產和知識取向進行了強有力的意識形態批判^③。瞿發展出一種新的文學類型——筆者稱之為「為革命服務的新聞式寫作」，可見於其題為《亂彈》的論文集裏^④。在這種文類中，瞿通過富於諷刺性和洞察力的議論豐富充實了自己的反精英論調，造就了1930年代的政治語言，繼而對整個二十世紀中共的文藝政策帶來深遠的影響^⑤。

瞿秋白在1935年死前於獄中寫下〈多餘的話〉一文。本研究將展開〈多餘的話〉橫跨三十年在歷史中被解讀的過程，以它從1937年出現到1968年《討瞿戰報》停刊前的這段期間作為研究範圍。本文是一篇文本(text，即〈多餘的話〉)的歷史分析，並非對歷史人物(瞿秋白)的解讀與定位。瞿的歷史定位與中共的早期歷史超出了本文的範圍，是筆者將來繼續研究的議題。

文學史的研究者通常對這篇奇文的比喻、暗碼進行了各式各樣的解讀，政治史的研究者則把這篇文章當作瞿秋白的一篇自我告白。本文欲圖整合文學史與政治史的研究成果，從比較、綜合的方式對〈多餘的話〉在三十年間諸多歷史情境內所產生的不同解讀進行剖析。本文將〈多餘的話〉的解讀分成四個階段，進行具體分析。第一階段(1937-1950)：在一個極為可疑的狀況下出版，國民黨將其當做反共宣傳，共產黨將其當做敵人的捏造。第二階段(1950-1964)：妾身未明，相關人物大多避而不談。第三階段(1964-1967)：慢慢成為歷史陰謀論的影射懷疑對象，作為「偽裝叛徒」的證據。第四階段(1967-1968)：《討瞿戰報》出版，被當做瞿秋白叛黨的鐵證，與〈李秀成自述〉一同被當做叛徒的告白，並開始被廣泛閱讀。簡單來說，1964年前，大多數與瞿有所交集的人物都盡量迴避〈多餘的話〉；1964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多餘的話〉在一個非常特殊、非常極端的脈絡裏被利用，成為了「偽裝叛徒」的樣板^⑥。筆者亦引進了一些新材料來討論文革前和文革時期策動歷史陰謀論的關鍵人物戚本禹在其中的作用。2016年《戚本禹回憶錄》的出版使筆者能將戚的活動與《討瞿戰報》聯繫起來。

本文點出，〈多餘的話〉在1937年的出現有着一個非常可疑、不確定的背景；除了陳鐵鍵與周楠本對〈多餘的話〉的歷史背景進行了仔細查證外，很少學者對其客觀分析過^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瞿秋白的革命聲譽雖未受質疑，但如何評價〈多餘的話〉，卻一直妾身未明。〈多餘的話〉在1964年前被冷待的遭遇、1962年的重新出現、出現之後的高度爭議性，乃至文革中瞿被打成叛徒，這一連串過程必須被看作一個連續發展的歷史過程。

一 一篇可疑的文章

1934年7月，在國民黨區域的中共地下組織已被徹底清除，而江西蘇區的紅軍數目銳減。當中共面臨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時，中共中央委員會決定撤退。10月，約八萬六千名共產黨人突圍向西逸去，國民黨的地面攻擊和轟炸